

陈鼓应著作集

# 庄子今注今译

(上)

陈鼓应 注译

中华书局

| 陈 | 鼓 | 应 | 著 | 作 | 集 |

# 庄子今注今译

(上)

陈鼓应 注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6.9  
(陈鼓应著作集)  
ISBN 978-7-101-11499-7

I.庄… II.陈… III.①道家②《庄子》-注释③《庄子》-译文 IV.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1538号

---

书 名 庄子今注今译(全二册)  
注 译 者 陈鼓应  
丛 书 名 陈鼓应著作集  
责任编辑 朱立峰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北京第1版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29½ 插页2 字数60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499-7  
定 价 110.00元

---



陈鼓应在台北最美的家中写作本书



陈鼓应与王叔岷（右）

## 《陈鼓应著作集》总序

### 一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

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 二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上,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的人性论》两书的内

容,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 三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



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 四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 五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村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

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

2015年4月21日

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

## 最新修订重排版序

本书最早于一九七四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三年以繁体字再度印行。一九七九年以后我旅居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数年间，对我注译的《老》、《庄》两书分别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继续交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四年我由美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我在北大讲课的十二年间，对文本有不少新的体认，还参考了曹础基先生等有关《庄子》注释的著作，对拙著进行修改润饰，一九九五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排发行，二〇〇七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以简体字排版印行。如今，北京中华书局以台湾商务印书馆本为基础，吸收了北京商务简体字本的新修订内容，再与中华原版复校，改正了原版的一些排印错误，全书增删异动之处约一百多条。中华书局这次的重排本，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一个修订本。

二

本书问世之初,为应合出版社之序列计划,故一概以“今注今译”作为书名。我在进行注译工作时,虽然处处用心在理解文本的原意,但在我运思下笔之际,总不免留着时代学术气氛和个人思考与情怀的烙印。因此,本书的今注今译,也可视为我对《庄子》所进行的一种现代人的“诠释”工作。

尼采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说,“看看那些吃着草走过的牧群,它们并不知道昨天或今天的意义”,“它们没有记忆,只是非历史地活着”。人类有记忆,有着长远的悲欢离合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沉溺在过度沉重的历史意识的负担中,则易削弱了他的创造力;但是如果过度缺乏历史眼光,那他的思想视野就会像阿尔卑斯山下的居民那样的狭窄。的确,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我们的历史文化,像我这样的一代人,所思所想的,很难从我生存的文化传统中切割开来,也很难从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抽离出去。

自从我来到世间,从有知觉的回忆开始,战争的恐怖景象就笼罩在我的周遭。我的故乡在福建闽西客家地区。抗战期间,即使那么偏远穷困的山区,还不时地遭受到来自沦陷区台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飞机的轰炸。每当急促的紧急警报声响起时,母亲就慌慌张张拉着我从城里逃往郊区。战事吃紧时,又搬到乡下读私塾。童年农村的生活,沉浸在浓郁的民间文化传统之中。从家庭到村落,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尊尊”、“亲亲”的习俗,一直影响着我。直到如今,我见到比我年长的人,

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敬意；比我年轻的，会油然流露出一种亲和感。殷周以来“尊尊”、“亲亲”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层面所流露出的人情关怀，我相当肯定。但是，历代儒家把文化传统转移到政治层面，推动所谓“移孝作忠”，塑造圣王式的人身崇拜，就必然导致儒术与专制政体相互温存的局面。而宋明儒家所虚构的道统意识，使权威体制、独断主义更加牢固。在这个层面上，我永远无法接受。

我的中青年时期，正处在“国府”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中。蒋氏政权以戒严时期为藉口而颁布“惩治叛乱条例”的恶法，该条例第七条为：“以图书、文字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该项条例的实施，我目击了数不清的爱国人士、作家、知识分子被逮捕，我敬爱的老师也受到过有形与无形的政治迫害。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媒体，却依然宣称我们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安定地区。这史称“白色恐怖”的专制政体，正是在美军的协防下，在中央情报局的技术支援下，展开了地毯式的清除行动，使岛内异己成为瓮中之鳖。这情境，令我难以忘怀。而正是在这种情境之中，我接触了尼采、庄子，乃藉由他们的论述而发出微弱的自由呼声。

尼采说：“一切作品中，我只爱作者用他的心血写成的书（write with blood），你能体会到，心血就是精神。”我们无论读尼采或读庄子的著作，都有这种深切的体会。庄子《逍遥游》最后一句话：“安所困苦哉！”从这弦外之音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所谓“逍遥”，实际上却有一种愤激之情在他生命的底层中波涛汹涌地激荡着。总之，在那“非常时期”的年代里，我借尼采和庄子

所发出的自由呼声,是有痛切的血肉体体会的。

### 三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大转折。我在千辛万难中获准到美国探亲,那个时期保钓运动正在各大校园热烈地展开,留学生的爱国热忱感染着我。有一次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园内,观看留学生放映的纪录片,我头一回看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实况录影,战乱的景象与我儿时的记忆相连,唤醒了我脑海中的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页的史实。鸦片战争之后,不只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欺凌我们,这一道道历史伤痕,将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民族意识作了实质的联系。这时《庄子》思乡情怀的声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越之流人……去国……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在我心中就泛起了一层新的时代意义。

同年秋天,我回台湾大学任教,留学生所兴起的反帝民族主义思潮似乎也随着我的返回校园而在师生的言谈间渐渐口耳相传开来,由是引发了台大校园内首次的统独论战。在一场年底举办的“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我和王晓波的言论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高度敏感,台湾当局为了进一步压制校园内的保卫钓鱼岛运动,遂指使特务机关利用寒假时机逮捕了参与反帝爱国运动的保钓人士。这个事件成为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导火线,在此事件中共有十三位年轻的教师被先后解聘。之后我被“安全”单位设定为殷海光老师过世后的首要目标,因而不被容许在台湾任何大学上课或演讲。这时只好记取着《庄子》的告

示：“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那几年里，我在家中读书思索，写出了一本小书《古代的声音》，藉古人抒发当时的心境。

世事峰回路转。一九七九年我全家获准赴美（自此之后有十四年长的时间被台湾当局禁止回乡探访亲友），一九八四年我获得机会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一九九七年，台湾大学校长及全体校务代表举行多次会议后决定给我平反复职。从一九八四年之后这一段时间，我重回学术园地，陆续出版了《尼采新论》、《老庄新论》、《易传与道家思想》、《道家易学建构》等书。目前另有两本新作《道家的人文精神》和《道家哲学主干说》正待完成，这些著作主要还是在中国哲学范围内所进行思考的课题。例如，两千年来的经学传统都认为《周易》是儒家的典籍，事实上，《易经》的卦爻辞早在老子和孔子还没有出生的数百年前就已出现，是先秦诸子的公共文化遗产。老、孔逝世之后一两百年所陆续形成的《易传》，乃是在诸子思潮激荡下产生的。《易传》的自然观、宇宙论及辩证法思想，皆属于道家学脉关系中的一环；《易传》的哲学化，基本上是承续着老庄思想发展出来的。从专业哲学来看，文化的孔子和哲学的老子，决定了千百年来儒道发展的重要起点：原始儒家所关心的焦点，大都属于文化议题；原始道家所探讨的内容，则大多属于哲学问题。综观中国哲学史，历代重要的哲学议题、思想方法、理论建构及其范畴与命题，大多为道家所创发。我所提出的这些论点，在两岸的学界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从一九八九年到二〇〇一年这段时间，我的写作主要是探讨

战国《易》学的道家化以及道家在哲学史上的主体地位等问题。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我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维角度，由以往文化儒家和哲学道家如何互补的问题，扩大到东西方文化如何对话的问题。

#### 四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倒果为因地发动了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其后果已经波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生态破坏等多重危机。我们再上溯到上一世纪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这情景让我们意识到，除了政治军事等因素之外，西方世界是不是在更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出了问题。

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尼采就已经敏锐地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他所提出的“价值重估”的学说，已经蕴含着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检讨。他指出，怨恨、复仇是基督教道德观形成的心理根源；而我们在现代霸权的军事行动背后，也不难看出其中所蕴含着的怨恨与复仇心理。

尼采之后，罗素也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反省西方文化的危机问题。罗素认为美国的文化基本上和欧洲是同源的，而欧美文化的形成有三个主要的因素：第一是希腊哲学，第二是犹太教的宗教观和伦理思想，第三是科学思想和工业主义。其中，罗素对西方宗教和伦理观的狂热性有尖锐的批评。罗素和尼采是如此的不同，但却共同地抨击宗教中的原罪观念。罗素在《变动世界的新希望》中指出人类有三大冲突：人跟自然的冲突、人跟人的冲突、人跟内心的冲突。罗素在西方文化中透视了人类在不停的冲突



中制造矛盾,因而兴起了对于和谐的向往。金岳霖先生也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自然采取一种征服、榨取的态度,他预测,这冲突势必引发自然界“洪水滔天、排山倒海”的反扑。金先生还指出,西方文化中,理想的人格型态是英雄主义。而我们从总是要压倒别人的英雄主义的行径中,也不难看到现代霸权动辄采取军事行动的身影。

今天,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如何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来消弭地区间的冲突,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

在中西文化中,最能够在异质文化间进行对话的,莫过于庄子。无论是苏格拉底的对话,还是《论》、《孟》中的对话,都比较属于同质性的对话;而唯有在《庄子》书中,可以看到它不停地运用异质性的对话来表达人间哲理。

在中国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庄子的思想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佛学思想进入中土,道家有接引之功,庄、禅的会合更在隋唐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北宋儒学明确排斥佛、老,却暗中援引庄子,在理论的建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上,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们遇到了比佛、儒更具有强烈异质色彩的西方文化,因此,中西对话的工作,需要儒释道来共同承担。而在共同承担之中,庄子思想最具关键性,因为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

中西文化如何进行对话,这需要另写专文来阐释。在这里,藉由为《庄子今注今译》修订重排版写序的机会,我抒发一下此